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1.005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五四运动

李春来^{1, 2}

(1.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浙江 温州 32503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 都值得国内学术界了解、借鉴。通过对西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做一全景式的“鸟瞰”, 介绍了西方学界有关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进程和代表性著作, 归纳了西方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的内涵、起因、领导权、性质、地位、影响、评价、反思等方面的重要观点, 论述了西方学者对五四时期主要思潮的论战、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等问题的主要看法。希冀能对国内的五四运动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主义; 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 4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1-0026-05

多年来, 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 都值得国内学术界了解、借鉴。因此, 本文拟对西方的五四运动研究做一全景式“鸟瞰”, 简要介绍其主要观点, 希冀能对国内的五四运动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概况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 西方人士就密切关注着这一运动。《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周刊》《亚洲》《纽约时报》《新共和》《独立》《国家》等刊物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高度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认为“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 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1]。这些关于五四运动的早期论述, 保存了大量五四运动的宝贵史料, 为以后西方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学术界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就开始着手对五四运动的学术研究,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 2013 年初, 西方研究五四运动的成果有: 专著一百六十余本、博士论文一百余篇、论文数百篇。根据其研究过程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将西方学者的五四运动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

1. 起步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青年学者的学

位论文中, 如周策纵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处于起步阶段, 有影响的专著较少, 较有代表性的是黄颂康(音)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阿姆斯特丹, 1957 年)。

2. 形成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

这一时期, 西方的五四运动研究领域初步形成。首先, 出版了西方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专著——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该书初步奠定了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至今仍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权威性著作。其次, 出版了一批资料性工具书, 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代表性的有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南》(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3 年)、刘春约(音)《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争论: 期刊文章(主要是五四和后五四时期)的分析目录》。第三, 对五四时期重要人物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李大钊的专著《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其他诸如瞿秋白、茅盾等人物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也有研究成果问世。第四, 研究内容开始展开, 对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以及工人运动的关系有了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代表性的著作是若克森·维克《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女性和自杀》(《中国季刊》1967 年总 31 号)、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第五, 五四运动 50 周年之际,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

心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五四运动的反省:专题论丛》(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

3. 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西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第一,对于五四人物的研究,一系列重要人物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代表性著作有:费侠莉《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黄宗智《梁启超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托马斯·C·郭(音)《陈独秀(1879-1942)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刘师培、张君勱、邵洵美、梁漱溟等重要人物也有相关成果问世。第二,开始关注地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陈约瑟(音)《五四运动在上海: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形成》(布里尔,1971年)、《上海五四运动期间的戴季陶、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近代亚洲研究》1971年第3期)、安格斯·麦克唐纳《长沙、湖南和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第三,开始关注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出现了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默尔·戈德曼《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等一批奠基之作。第四,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例如,詹姆斯·E·瑞德《中国的支持者:北美新教教士和五四运动(1919—1922)》、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9年)三本著作分别从外国教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思想史等独特视角展开了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4. 调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国家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始步入一个“转型时期”,“以往的研究模式无法做出合理解释”^[2],西方学者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以往的研究模式进行反思。相应地,西方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也开始反思以往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以往研究中不太注重和忽视的地方,如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代表性著作有:阿里夫·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民国》1986年12月第12卷第1期)、微拉·施瓦支《重评五四运动:

在民族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民国》1986年12月第12卷第1期)。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维京书店,1981年)、史从文(音)《从沉默回归:五四传统的中国作家》、微拉·施瓦支《五四经验:中国的近代学校和一代人的出现(1915—1927)》和《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明显不如70年代繁荣,周策纵、林毓生等五四运动研究的重量级学者纷纷转向其他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的主体基本是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5. 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随着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到来,西方学界再次掀起了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热潮。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第一,在世纪之交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将五四运动放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当中进行宏观的审视,着重探讨五四与现代性、继承五四遗产等话题。第二,在前几个时期的研究基础上,将五四运动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有了新的创新。开始研究武汉、哈尔滨、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四运动。人物研究方面开始更多关注像恽代英、叶圣陶、朱光潜、郭沫若这样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第三,对以往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如五四知识分子的民主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外国教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第四,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加强了和大陆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召开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周策纵、林毓生、舒衡哲、唐德刚等众多知名学者与会,向国内学界介绍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葛思珊《我所学到的真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家庭改革与男性身份》、李·尼尔森《政治公共空间如何诞生?天安门广场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政治地理学》,2009年)。

二、主要观点

1. 关于五四运动的内涵

第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广义“新文化运动”和狭义的“五四事件”,即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3]。相应地认为五四时

期主要指1915年至1923年这段时期。大多数西方学者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五四事件”,不能将之等同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仅仅指北京5月4日的游行和五四事件后发生的有关的全国范围的事件,最终以1919年6月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结束”^[4]。五四运动是“围绕着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并不与‘新文化’有关。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5]2-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相应的认为五四时期仅仅指1919年5月4日至6月18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关于五四运动的起因

经过多年的研究,大多数西方学者摒弃了早期所持有的五四运动“自发性”的观点,开始承认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与大陆学者一样,他们也多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来探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经济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经济变革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战后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增强;政治上军阀主义盛行、政局动荡;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新型知识分子、新商人、实业家和城市工人的兴起;随着普遍王权崩溃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为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性”,经过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20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探索,五四时期的第三代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国内启蒙运动的发展,新思潮流行;巴黎和会失败,民族主义兴盛,以及日本“抢米风潮”、朝鲜“三一运动”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上述所有因素共同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3.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共同领导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进步党部分党员四派中,前两派和后两派中的拥护民族思潮的分子,实际上担当了五四运动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人”^{[3]14-15}。第二种观点可视为“自发性运动”说,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群众性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力量。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推动五四运动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组织;使其合理化的则是新思想”。即“五四运

动(北京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主要来自学生”^{[6]18}。第四种观点认为是第二代知识分子和第三代知识分子这两代五四学人通过复杂的“代际合作”与争论,共同领导了五四运动^{[7] 9,31-32,96,352,363,380}。

4.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

西方学者基本都同意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的一次爱国抗议运动”,但在关于五四运动究竟只是思想革命还是包括政治和社会革命上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3]216};另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源于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它要求政治上的公正而非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强调国家的权利而非阶级的权利。因此五四运动不能算社会革命^{[8]1309}。

5. 关于五四运动时期主要思潮的论战

对于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论战中,西方学者关注最多的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种观点认为,“主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导向问题的解决,而且甚至会产生它本身的新的问题。在五四诸多特定的主义和问题背后,隐现着有关文化的本质、意识因素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和政治的关系等持久的理论性问题^{[5]14};另一种观点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争论的中心是中国的问题究竟应该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缓慢的、进化的和非政治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隐藏在‘问题与主义’争论背后的,是两种势不两立的行为准则”,即“根本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对这两种行为准则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者生涯和政治生涯的选择^{[9]111}。

6. 关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大多数西方学者承认“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单单是五四运动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中国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它曾多次屈辱地战败;中国崇尚权威的政治传统;对于一个以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所具有的更大的吸引力;国民党在运动期间及其后所实行的各种政策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为争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可恨

的帝国主义手段,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错误政策和缺乏效率,都表明了西方文明的致命弱点。西方国家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政策和态度。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要归于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平凡无奇的并显然旷日持久的纲领缺乏耐心^{[3]219}。第二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出发点既非亲苏维埃,也非亲社会主义。事实上,“五四”运动的青年领袖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把西方看作是其主要的支持者。对议会民主的破灭以及对日本强烈的愤恨,这两个主要的外因,加之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漠然及无助,促成了北方对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寄予厚望,因此,播下了中国激进主义的第一批种子。第三种观点认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应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反帝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击败外国侵略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全面胜利。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与中国知识界的那些激进分子的“反资本主义”的心理状态是完全吻合的^{[8]1397}。

7. 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

西方学者大都敏锐的注意到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认为“五四标志着知识分子在经历一个脱离政治的时期以后又回到了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创造了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行动的推动力为主导的新的文化环境,从这个新的环境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9]121-122}。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例如,李蒂甘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研究组和政治性会社,后来成为全国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10]。德里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在“五四”初期激进运动和文化中产生的学生团体为基础的,它们成为“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如果原来没有“五四”时期的激进团体,共产主义组织的处境或许更为艰难,也不会如此强大^[11]。

8. 关于五四运动的地位

对于五四运动的地位,随着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全面高度肯定。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的第一个运动”,理由是“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运动”,“普遍性”涵盖了地理范围、社会范围、思想范围^{[6]18}。强调“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

子勇士的精神食量,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7]31-32}。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另一种观点是反对将五四运动的地位无限拔高。认为“五四时代许多最大胆的思想,早在1919年以前就在中国出现了”。五四运动“不再像一座从平川上突兀拔起的山峰,而只像是一脉连绵丛山的山峦。”五四运动必须被视为一个已出现潮流的最高点,而不是一个质变的新起点。把五四运动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里程碑,预示着对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即将到来的解释过于简单^{[8]1309-1311}。

9. 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

一种观点是着重强调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认为五四运动就短期效果而论,它坚持外抗强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进了爱国运动,发扬了民族主义。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一种世界各种文化、文明互相比较、检讨、融合的先驱。五四的民主、科学的主要口号和求革新的目标和遵守百家自由争鸣的原则,值得检讨、批判、继承、发扬。使白话文成为全国人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这一成就的重要性。是中国人一件极大的变革和专折,不仅牵涉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建设^{[8]36}。“五四运动使中国走上了永不回头的、光明的启蒙之路”^{[8]363}。另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影响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认为中国仍旧没有能够从青年民族主义情感转化为巨大的民族联合^{[8]1311}。

10. 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

西方学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基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观点侧重于重估五四运动。认为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的成就是大成问题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五四以后的“白话”语言,并未有助于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知识分子的大众主义意识相契合。在语言领域,五四可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1919年五四事件前后的思想应该被称作一次失败。它未能使中国从它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它未能使科学或民主制度化^{[7]85}。第二种观点则强调要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认为尽管五四的“全盘西化”是一种幼稚的错误,

但这一概念的本身已明白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改造。仅此一点,“五四”的功勋便足以永垂不朽了^[12]。第三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有功也有过。一方面,强调五四最重要的成就一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二是“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实际变革”。简言之,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指出五四运动的缺陷在于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过于轻信,对于西方思想,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过于自信地认为,凡是他们以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内中国实现,缺乏耐心和持久性。

11. 关于五四的反思

众多西方学者都一致认为要在继承五四遗产的基础上,超越五四。一方面,继承五四“重新估价一切”的精神,对古今中外一切问题和主张都要用“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价一番,加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希望不作盲目的接受;另一方面,吸取五四教训,不再“全盘反传统主义”,要培育并促进真正伟大的“奇理斯玛”(即权威)。“要为中国文化的前途摸索出一条独立发展的大道”,“完成中西文化的真正有生命的融合!”同时,一些学者还告诫到,由于“救亡与启蒙以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启蒙运动远未清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历史并没有结束。思想解放依然是中国十分紧迫的任务。”

参 考 文 献

- [1] JOHN D. New culture in china[J]. Asia,1921,XXI(7): 581-586.
- [2] 梁怡,李向前.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12.
- [3] 周策纵.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 周子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4] CHEN J 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J]. Modern Asian Studies,1970,4(1):63-81.
- [5] BENJAMIN 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 [6] ARIF D.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J]. Republican China, 1986,12(1):3-18.
- [7] 微拉·施瓦支. 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M]. 李国英,等,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8] 欧阳哲生,郝斌.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9] 莫里斯·迈斯纳.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8.
- [11] 阿里夫·德里克.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 孙宜学,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3.
- [12] 王跃,高力克. 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37,148.

The Western Scholars' View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 Chun-lai^{1, 2}

- (1.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Wenzhou Party School,Wenzhou 325027,China;
2.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f CAS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academia have made enormous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merit the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counterparts politically and academically. With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western studies abou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istor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western academia's research about the main content,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the important points of view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Culture Movement; doctrine

【编辑 程广平 高婉炯】